

丛滋杭 著

中国古典诗歌

英译

理论研究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 理论研究

丛滋杭 著

Y
14315.1
34

国防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选取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理论作为研究角度,将众多中西方译者的汉诗翻译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从哲学高度,从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宝库汲取养料,突现汉语,尤其是古诗语言的独特性,从理论的深度提出自己的见解。本书适合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者、大学教师、外语专业(翻译)研究生、本科生以及翻译爱好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丛滋杭著.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 1

ISBN 7-118-04870-4

I. 中... II. 丛... III. 古典诗歌—英语—翻译理论—理论研究—中国 IV. ①I207.2②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7686 号

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新华书店印刷

新华书店经营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 1/2 字数 206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 (010)68428422

发行邮购: (010)68414474

发行传真: (010)68411535

发行业务: (010)68472764



序

在丹桂飘香的十月,我收到丛滋杭老师从杭州寄来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手稿,这是她近年来呕心沥血写成的专著,并约请我为之作序。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分为五章,约20余万字。在第一章《绪论》中,作者扼要地阐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特征、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研究现状和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 research 展望;其余四章,作者分别详细论证了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主体、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技巧和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的发展趋势。这是一部有别于那种“言必称希腊”的新八股论式的著作,也摆脱了那种“支离破碎的、经验型、感想式的只言片语论文模式”。它是一部内容丰富、立论明确、结构缜密、行文流畅、很有特色的理论研究专著,因此很值得一读。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诗的王国。

中国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的传统。孔子曾参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搜集整理工作。孔子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并把学习《诗经》当作培养教育弟子的一个重要方面。秦汉以来，历代都有名篇佳作流传于世，特别是唐诗、宋词、元曲和清代、民国的诗词歌赋，浩如烟海。有许多朗朗上口的古典诗歌孺妇皆知，常能背诵，即使在一些边远的山村，村民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村里的老人小孩都常以背诵古典诗歌为荣为乐。无怪乎欧美学术界特别是汉学界就流传这样一句话：“要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它是了解中国丰富文化的宝库。”的确，西方学者想要真正了解中国，就不能不研究和了解中国的诗歌。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古典诗歌以其丰富的内涵、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性，为我们中华大地描绘了一幅幅无比生动的社会历史画卷，为我们研究历朝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艺术和社会提供了一篇篇珍贵的史料。但是，要读懂中国的优秀诗篇，特别是了解流传至今的中国古典诗歌，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即使是中国读者，除了要了解其历史背景之外，也还有一个要弄清楚其语言文化的问题，更何况要翻译给外国人看。选译什么，如何译法，这既是一个普通的常识问题，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记得两年前，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校园里，在刚刚举办完了全国第11届科技翻译学术研讨会后的那个明星稀的晚上，作者与许建忠、黄忠廉、杨柳等教授和本人在校园东门的一座优雅茶座里品茗时，又专门探讨了在大会上语犹未尽、会后还想继续谈谈的译坛上普遍关心的一些学术问题，其中就有这个大家共同感兴趣的中诗英译问题。当晚时针指向十二点多了，我们大家还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边走边谈，丛滋杭老师似乎一直沉醉在首都八月的诗情画意里，也让人看到了她对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理论研究的热情和执着。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先后读到杨柳博士的《林语堂翻

译研究——审美现代性透视》、黄忠廉博士的《翻译方法论研究》，不久前，还收到李照国教授赠送的大作《译海心语——中医学文化翻译别论》，以及许多其他中青年教授的论著。现在，又看到了丛滋杭老师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真使人深切感到译坛上人才辈出，令人振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翻译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直到20世纪末，我们的翻译大多或者说主要还是停留在外译中上。多年来，虽然也不断有人进行中译外方面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但仍以停留在一般的文学和文献翻译上为多，其深度和广度上都是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需要的。在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理论研究上，专著尤其少，其中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也应该是“俱往矣”的时候了。人类进入了21世纪，中国加入了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不可阻挡。中国要在经济上同国际接轨，中国需要了解国外，国外也更需要了解今天的中国，机遇和挑战并存，这是勿庸赘言的。所以，在中译外和外译中方面，翻译家们应有自己的翻译策略和范畴，应理解翻译效果的复杂性。既不能再有盲目的继续“意识形态上的排他心理，以及诗学上的自负心理”，也不要有一切盲目的“崇洋迷外”、“全盘西化”的浮躁心态；而应通过平等交流，吸收、借鉴外国的语言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弘扬和保护本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由于中外语言文化上的不同，导致其哲学思想、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因而必然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我们必须建立中西方友好交流的平台，必须允许探索“汉诗英译的第三条道路”。而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独辟蹊径，勇于探索，勤于钻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十分成功的。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学术著作的成功，不仅在于作者审视了中英翻译理论的现状，借鉴了国内外同行、学者有关研究成果，更是首先在于作者的一直在进行对比研究和从新颖的理论视角，注入了对文学翻译批评的创新思索。这种从人学和文学的视野升华到中外哲理概念上的交融审视，就突破了

以往翻译研究上的那种因循守旧的格局。这也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符合和平崛起的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自然也符合建立和谐世界的愿景。

巴金说过，为了存在和发展，我们有必要进行反思。翻译的哲学思考也是对翻译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的反思。这种抽象研究并不是玄学研究。抽象与否，思辨与否，是理论的形式问题；脱离实际与否，是理论的内容问题。翻译哲学关心的仍然是翻译方法论问题。令人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既不能脱离其诗歌产生的实际历史时代，也不能不涉及其审美的变化。事物总是在变化着的，翻译也是一种变化，翻译观应是一种哲学变化观。我们的翻译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经验主义、唯心主义，更不能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基于这种翻译观，作者的英译翻译理论研究，就有了扎实的基础，就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这些年来，作者除了教学外，一直从事翻译研究，发表了一些观点鲜明的科学翻译研究论文。她通过科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对比研究，对众多的理论命题有了透彻的了解和认识，因而使自己对英译理论研究产生了突破性的认识和飞跃。也就是说，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跟做其他学问一样，必须严肃、严谨、严密，具有高度的审美情趣。不仅自己欣赏，还得让异域读者欣赏，要使交流双方的读者能懂得翻译语言的“无限意，意在不言中”。这种新颖思维，对于中国翻译理论的拓展和中西文化交流，都具有其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

我很高兴丛滋杭老师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得到了树人大学的领导和同行学者们的大力支持，现在该书即将出版了，这是大学都高兴的事，特此致以衷心庆贺。是为序。

李亚舒

2006年11月于中海馥园



前言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跟上了西方翻译研究的步伐,如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最本质的进展是越来越注重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诸如共同的规则、读者的期待、时代的语码、探讨翻译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运用新的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述等。在 21 世纪的今天,随着与国外在学术等方面的交流日渐频繁,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汉译外的重要性,即主动、积极地把我国丰厚、精深、博大的灿烂文化通过翻译家之笔介绍给世界各地的读者,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汉诗英译理论研究这一领域涉足者较少,且大多以论文形式出现在一些外语类刊物上,比较零碎。2005 年河北大学出版社曾出版汪榕培等人编的论文集《典籍英译研究》,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而且包罗小说、戏曲、诗歌等。从

汉诗英译的角度，对中西方翻译理论和实践作了批评性研究，并在译界众多学者翻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汉诗英译的具有创造性意义的理念和方法，即从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中寻找极为丰富的资源供翻译研究使用，用反映我国古代人的审美意识的“中和”说来翻译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让其走向世界，无疑为一不错的思路。在古汉诗英译批评中主要突出以下思路：首先，翻译，不仅仅是翻译自身的问题——不仅仅是翻译的可操作性、实践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或跨文化的作用与意义的问题，它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问题。其次，翻译中要突出中国美学的整体性、同一性和互动性，即情、意、境；物我的同一、物象的同一；主客互动、“神物”互动、“神”与“物”游、情境互动等。第三，翻译中提倡研究和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思想，探索翻译艺术所应采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摒弃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片面或孤立的思维方式。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笔者这些年来在“古汉诗英译批评”这个话题上做了一些思考。对于翻译的认识，人们的观念是在不断变化的，因为认识本身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认识的正确与否从来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历史的；认识本身固然重要，然而认识的针对性，即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背景下、针对什么样的问题而提出什么正确的认识和对策，才是更为重要的。汉诗英译中原诗“模式”的转化困难，应归因于中西方“道”与“逻各斯”两个终极概念的同中之异。“道”与“逻各斯”虽都有着相同的言义之辨，但中国的言“道”之途与西人表“逻各斯”之径有所不同。反映在诗歌表达上，物象与物象之间、主体与物象之间、主体与物象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安置较为随意而不确定，并不拘泥于思维逻辑上的限定。“逻各斯”较注重逻辑思维在语言表达上的运用，造成了英语重形合而轻意合的现象，从而要求用时态表现时间先后顺序和诸如用方位介词来体现空间位置的排列。与形态语言相比较，就可以看到汉语独特的美学素质：

重意念、重形象、重感性、重神役（神合）、重了悟，诗歌尤其如此。汉语中性、数、格、时、体、态、级、语气等等未有不可以用词汇表示者，也都不具备表示语法范畴的形式标志，一切都靠意念来维系，所谓尽在不言中。这与中国哲学思维源于人本、注重思想有着直接关系。

老子从“道”具有“有”和“无”两种性质得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结论。从无形无象到有形有象的过程是：道生于一。这里“一”的性质就是浑然一体中存在，是最原始的物质。在道生一、一生二的基础上推出的三生三，内容更加生动而深刻。用老子的话说，是一种宇宙生成论，是有了统一观念、对立观念后产生的一种中和观念。现实世界中人们碰到的万事万物，表面看来杂乱无章，但经过理性追究，会发现杂乱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对立，进而发现对立中的和谐。由三生三演绎出的辩证矛盾的范畴，不仅反映了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而且推演出事物生灭变化的实在过程，即事物内部的既同一又斗争的矛盾运动，使矛盾双方的力量处在此消彼长的不断变化中。一旦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便引起双方地位的相互转化，于是新矛盾取代旧矛盾，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所谓第三点，则是正反因素融和而成的代表事物本质的点，那么如何加以界定呢？俞明三将此分为“理想第三点”和“现实第三点”。前者指一类事物在一般情况下的第三点，后者指某一事物的具体第三点。理想第三点，用黑格尔的度的观点来解释，就是质和量的统一点，是事物保持自己质和量的限度，是和事物的质相统一的限量。具体事物的第三点，是各对正反因素以不同比例融合而成的坐标点，它呈现某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特征。理想第三点与现实第三点的关系实质上是绝对与相对、可能与现实、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长期以来，“一分为二”始终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这有其历史渊源。宋代理学家朱熹说：“一每生二，自然之

理也”。明代思想家方以智也说：“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这都是说一分为二规律的普遍性，表达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程度的认识。事物的第三点是对事物进行一分为二分析时的分界点、分界线或分界面，也是表示事物解析式中的常数。一句话，第三点实质上是对立统一，合二为一。合二为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主要用来表述对立面的依存和联结这样一个辩证的方面。人们有时候着眼于从对立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有时候又着眼于从统一中有对立去把握统一，这样做都不违背客观辩证法的要求。应该看到，矛盾双方在一个统一体中的结合，以及双方处在某种平衡状态，这是客观世界中经常存在的现象。任何个别运动总是趋向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为事物的变化准备着必不可少的条件，带来了事物的避无可免的发展；而发展或整体的运动又打破了个别的平衡。因而，虽说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但是，“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9页）对此，庞朴给出了中庸的四种形态——A而B，A而不A，亦A亦B，不A不B。第一式“A而B”，如温而厉、绵里藏针，是立足于A兼及于B，以B来补A的不足。第二式“A而不A”，如威而不猛、乐而不淫，明里是就A防A的过度，暗中却是以B为参照来扯住A，是“A而B”式的反面说法。第三式“亦A亦B”，如能文能武，亦庄亦谐，平等包有A、B，是“A而B”式的扩展。第四式“不A不B”，如不卑不亢，无偏无颇，超出A、B而上之，是第三式的否定说法。凭借两端来认识中间，进而组合两端来表述中间，此中饱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这是认识到中间与两端互不可分、三者共成一体积极表现。这里的四式在哲学上就是“三”，三就是多，多必归于三，“三生万物”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种状态”的提法最早见于杨晓荣“二元对立与第三种状态——关于翻译标准问题的哲学思考”。在翻译标准从二元现

象到二元对立的冲突中，她以冷静、理智的眼光进行分析，换一个角度，从哲学中找答案。“第三种状态”体现了哲学上的“折中”，但并非各打五十大板的“正中”，而是“适中”，即两个极端之间的一个最合适的位置；同时也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中庸”，即契合了庞朴的“中庸四式”。翻译活动的特点，尤其文学翻译，决定了翻译理论研究的综合性。杨晓荣试图用“第三种状态”来协调不同的翻译观点，也就是“以协调、平衡为基础的大体上符合各方要求的相对稳定的状态”。笔者以为，这种提法似有“一厢情愿”的意味，即上面提到的“理想第三点”。翻译活动并非是抽象的事物，而是具体的、个别的，有其特殊性，不同文体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科技类与文学类的翻译标准不可等同。文学翻译或诗歌翻译可能适合“第三种状态”说。当然，她的目的是希望人们换一种思维方式来看翻译标准，“这种宏观的思考也许反而更有利于排除枝节、走出偏见、接触实质性的东西，……无论是对于翻译实践（寻找合适的‘度’），还是对于翻译理论研究（探讨翻译的性质以及与翻译标准有关的各种问题），都会具有积极的意义”。笔者以为，“第三种状态”说应定位在文学翻译批评，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笔者赞同郑海凌的提法，即将现象翻译与实在翻译区分开来。现象翻译指在句段和语篇层面上展开的，是译者个人的具体操作；而一般的翻译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是指人类的一切翻译。作为抽象概念的实在翻译，它和直观的言语转换（现象翻译）的区别在于，首先，它涵盖的是一切翻译的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是翻译固有的，它不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相反地，还会对人的行为产生规约力。实在翻译是一种可能性，是历史文化关系的集合，是语词在可能性空间里展示的结构形式。正如阿多诺所说：“每一个外文词都包含着令人耳目一新的因素，在它有节制的运用中包含这样一种知识，即那些直接的东西不能以无中介的形式言说，只能通过反思与中介作用才得以表达”。语词在历史的时空里随着表达者的意向流动遇合，构成具

有历史相对性与文化差异性的话语和文本。总之，一方面，把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成外文，使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走向世界，这是我国翻译工作者当仁不让的职责；另一方面，将散见于一些学术会议和某些学报、外语学术刊物上的典籍英译类的研究论文、书籍加以整理，从中国古代哲学、文论的高度，科学、系统地进行深入研究。中国典籍翻译理论研究应该是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显得有些滞后，比较薄弱。本书作为汉诗英译理论研究专著旨在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做些探索工作，为我国典籍翻译理论研究的兴起做些努力。

最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国的翻译研究中，翻译研究的理论意识已经觉醒，这不仅反映在国内一些权威刊物和有关学报上，还集中地反映在国内出版界近一二十年来推出的一些颇具规模的翻译研究丛书上。这些学者们不再纠缠于一些老掉牙的问题，而是另辟蹊径，或从西方译学理论寻找理据、或从中华文化宝库找到依据、或结合中西翻译思想做比较研究。总之，开始跳出西方翻译理论一统天下的藩篱，“惟西是趋”、“惟新是趣”正在被中国译论“要说自己的话”的呼声所取代。有学者对中西译论做过比较后得出：中国译论的主要特征是整体性的印象感悟，而西方译论的主要特征则是随时而变的、片面的、分析的、各执一端的、并且往往以一端为全部真理。创建中国译论成了水到渠成的事：第一，它以现代观念去整理中国的译论遗产，以探究中国译论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第二，它以创造性思维对西方的译论流派进行变异，从而在西方的译论流派史上也刻有中国的名字；第三，它以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去整合西方片面精确的译论，使之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得以综合。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西方就有学者开始对50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除了对50年代—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外，还将西方译学界的代表人物分为六大学派：语文学派、

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及解构学派等。可以看出，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其余四个学派都是近 50 年来发展起来的。就我国翻译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问题在于起步较晚，刚从心得、体会和经验这一步走出来，理论提升才刚刚开始。相信随着时日的推移，我国翻译学学派的创建指日可待。中国古典诗歌的成文之道必定会影响到对其的译文之理。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既然能被运用来考察诗歌的成文之道，译文之理也不妨置入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范畴体系中加以审视。本书的撰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本书选取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理论作为研究角度，将众多中西方译者的汉诗翻译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从哲学高度，从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宝库汲取养料，突现汉语，尤其是古诗语言的独特性，从理论的深度提出自己的见解。

刘宓庆说：“汉语最深层的独特性其实只有一个：意念主轴，其他都是“派生的”（derived）”。意念主轴使汉语句法获得了充足的自由度，也使意义本身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此外，汉语还具有由意念主轴派生的鲜明的特色：因简单的直接对接，即所谓“意合”而形成的高度简约性使意义浓缩化；汉语具有明显的解释性和描写性；审美感性与语言感性的完善“嵌合”。这就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解理论，同时，这是个新问题。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在不断提升，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是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同于外译汉、汉译外，古文，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棘手问题。我国翻译学界尽快创建自己的学派，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如果能为推进中国译学流派的建立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作者将感到不甚荣幸。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中国古典诗歌的特征	2
第二节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研究现状	9
第三节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研究展望	15
第二章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主体	18
第一节	译者的主体性	18
第二节	译者的多重角色	31
第三节	译者的风格	40
第四节	翻译超越论	50
第五节	文学翻译批评新思索	58
第六节	从释意理论谈翻译单位	67
第三章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	79
第一节	中国古诗中“理”的多维性英译	79
第二节	文学翻译中的意义指向	88
第三节	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	94
第四节	“神韵”和“神似”	103
第五节	古汉诗翻译中意义的多重性	113
第六节	古汉诗英译中的意境	122